

傅斯年的史學思想

朱淵清

提 要

傅斯年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史上著名學者。他創辦史語所開創了中國現代文科學術。傅斯年提出的“史學即史料學”是一種現代史學的方法理論,提倡以史料為導向進入過去事實,主張史學研究應該從事考證和考古,而免於意識形態和政治關係的干擾。本文論述了傅斯年史學思想的內容和形成,並就傅斯年的科學思想、“史料”概念、歷史學和語言學的關係、考古學以及證據法五個方面予以解讀分析和理解的批評。

關鍵詞: 傅斯年 史語所 考古 史料 遺迹

傅斯年,1896 年出生,1950 年去世,僅僅活了 55 歲,但却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作為學術組織者,傅斯年對現代社會的職業分工和道德有著清晰的認識和踐履,^[1]他創辦的史語所是中國現代學術的“路燈”和“指標”(陳槃語),在中國開創了現代的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等多個文科學科,並使這些學科迅速走向了國際。作為學者,傅斯年數目不多的論文,如《夷夏東西說》、《大東小東說》、《性命古訓辨證》等擲地有聲;他提出的“史學即史料學”是一種現代史學研

究的方法理論,傅斯年反對傳統,反對疏證,反對“史觀”,強調科學精神、經驗實證,提倡以史料為導向進入過去事實,主張史學研究應該從事考證和考古,而免於意識形態和政治關係的干擾。傅斯年的史學方法理論形成于創建史語所、發起殷墟和城子崖等考古發掘的實踐活動,《史料論略》則是其史學方法理論的系統論述。

一 實踐與思想

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現代中國學術的開始。史語所并列歷史學和語言學,是以德意志國家研究機構為模型設立的,當時的主事者蔡元培、朱家驊、傅斯年都曾留學德國,對德國科學研究體系充滿敬意。朱家驊《紀念特刊序》說,傅斯年將歷史與語言并列是受德國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語言歷史學派理論影響,并經過詳細的考慮而決定的。許倬雲探討當時德國學術發展的方向及其背景,指出“為了解除天主教會的普世秩序,德國學者孜孜努力于建構一個日爾曼民族國家的工作,用實證史學,建立俗世歷史與民族歷史,用語言學確認日爾曼語系的周延,用神話與民族研究,追溯日爾曼民族的淵源。凡此學科的工作,當時似乎沒有具體的協調,却是齊頭并進,集聚學術的力量,建構了‘德意志精神’的理念,由此發展出德國人強烈、濃厚的民族主義。”^[2]

傅斯年創建史語所將歷史與語言并列,還有對法國漢學成功經驗的借鑒。顧頡剛晚年回憶:“傅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五四時期西方漢學尤其是法國漢學研究給了中國學人深刻的影響。北大《國學季刊》發刊時刊登了伯希和(Paul Pelliot)1911年就任法蘭西中亞語史學講座時的講演辭《近日東方古語言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伯希和指

出，由於古物學和古語學的復興，改變了原來中亞史研究僅僅根據文獻典籍的狀況，因此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這篇演講辭是王國維在1919年翻譯的，王國維稱此文“實舉近年東方語學、文學、史學研究之成績，而以一篇括之。”傅斯年對伯希和和另一位巴黎學派代表人物瑞典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十分敬佩，為漢學取得的成績所激勵，他立意要建立“東方學”以取代“國學”和“漢學”，要使中國成為“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

傅斯年在留學歸來之時，就有聯結語言和歷史兩門學科的學術理想，欲以文獻考據與語言學研究為歷史學研究之共同基礎，寄希望振興歷史學以抗衡西方日興的學術。1927年8月，歸國不久的傅斯年就在中山大學創辦“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研究所周刊》的《發刊詞》強調，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所有學問中成績最豐富，應該承受現代研究學問的最適當的方法。語言歷史學正和其他自然科學同手段，所差只是一個分工。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衆中尋方言，到古文化遺址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

傅斯年很快就得以在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中推行自己的理想。1928年1月，傅斯年向蔡元培建議在中央研究院下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不久國民政府批准籌辦。1928年9月，傅就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0月史語所在廣州正式宣告成立。

1928年5月，傅斯年撰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0月該文以研究所籌備處名義刊登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上。《旨趣》確定了史語所的工作方向、研究方法，也反映了傅斯年的史學思想概要。

在這篇科學宣言中，傅斯年首先指出歷史學和語言學都是最近才在西方發達起來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

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日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他又說到產生於18、19世紀之交的語言學的發展,已蔚為大觀。“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在的語言學的成就也很能副這一個大題目。”然後又指出中國的歷史學、語言學本來發達很早,但近代以來却落伍了。

傅斯年認為要建立科學的歷史學、語言學,判定學科進步的標準是: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2.“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3.“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據此三條標準,傅斯年提出:1.“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就是“照著材料的分量出貨物”,“利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的處理實在問題,因解決之問題更生新問題,因問題之解決更要求多項的材料”。2.“擴張研究的材料”。3.“擴張研究的工具”。並聲明:1.反對國故。2.反對疏通。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就自然顯明。3.反對普及。史語所是科學研究機構,用不著誘導別人愛好它。

1929年6月,史語所遷入北京。史語所成立初,分8個組(《旨趣》上擬分9組):史科學組、漢語組、文籍校訂組、民間文藝組、漢字組、考古學組、人類學名物組、敦煌材料研究組。1929年6月,合并保留3個組:歷史組(第一組)、語言組(第二組)、考古組(第三組),後來又成立了人類學組(第四組)。史語所的創立,是“無中生有的志業”(杜正勝語)。在實證求真的科學精神引導下,史語所網羅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者,^[3]短短20年,就享譽世界學林。到傅斯年去世為止,史語所共印行專刊30種,單刊25種,集刊22種,《史料叢書》7種,《中國考古報告集》2種,《人類學集刊》2卷。《史語所研究集刊》最為學界所重,共

發表論文 448 篇。

史語所語言組以現代語言學徹底替代了傳統的小學。傳統的文字、音韻、訓詁本來只是“小學”，是經學的附庸，只能說是語文學（philology），而不是語言學（linguistics）。^[4]一直到民國初年，章黃學派的研究始終還是囿于《成均圖》、“一聲之轉”的舊方法中。傅斯年對這種舊學作了尖銳批評，批評章太炎在文字學以外不過是個文人；而在文字學以內，章太炎不僅不如研究甲骨文之孫詒讓、研究金文之吳大澂，甚至不如阮元。因為章太炎不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還反對別人使用新材料。李方桂後來承認他的研究起始於實在看不過章黃學派那種不科學的研究方法。^[5]傅斯年對語言學有這樣的識見，是因他在柏林期間對梵文、藏文、緬甸文等下過功夫。^[6]傅斯年認為語言學所要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境內的各種語言，他開列史語所語言研究對象包括：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語言學。語言組在趙元任、李方桂領導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廣泛的語言和方言調查。對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等進行了全省性的漢語方言調查，對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等地的壯侗語、苗瑤語、藏緬語等少數民族和其他語言進行了調查。並在南京北極閣建立了語言實驗室。比較語言學在非漢語研究方面成就最為顯著，不僅成就遠超清儒，且可在國際上比肩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和馬伯樂（Henri Maspero），在藏文、西夏文、漢藏比較領域成績顯著，在侗臺語方面，李方桂是開創者和集大成者。趙元任、李方桂還開啓了中國結構主義語言研究方法。^[7]傅斯年本人，尤其重視語言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他雖然沒有能夠完成對語言學、歷史學之間關係的論證，但是他的《性命古訓辯證》是一種可貴的努力，雖然這種努力還只能局限于思想史，實際上仍是乾嘉皖派訓詁的延續。

傅斯年要把史料學做成史學的“中央主題”，傅斯年將史語所同道稱為中國的蘭克學派。史語所強調新史料的開掘和利

用,極度重視原始資料,對於原始檔案資料的搜集整理不遺餘力。李濟說,傅斯年告訴史語所同仁一個原則就是找新材料,大家始終堅持這條原則。傅斯年的口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李濟回憶,史語所最初創辦的時期,傅斯年以全力鼓吹并獎勵在所的工作人員擴張研究的材料,他的兩句膾炙人口的標語初看是漫無限制的,不知由何處開步,從何處著手,不過在很短的時間,他就為第一組找到了內閣大庫的檔案,指定了漢簡與敦煌材料的範圍;為第三組劃定了安陽與洛陽的調查,二十年來的工作充分地證實了作這些決定的遠見。在他的號召和指導下,史語所搶救收集了大批瀕危的文獻歷史資料,發掘了衆多珍貴的地下歷史材料,開創了一代學術的新風。

史語所處置材料則存而不補,證而不疏,整理資料時排除任何主觀的影響,重視對各種史料的校勘比對。歷史組的工作重心是整理清內閣大庫檔案和整理校勘《明實錄》。清內閣大庫檔案是清政府藏於內閣大庫中的明末至清代的詔令、奏章、則例、賀表、案卷、實錄、殿試卷和各種冊簿等。^[8]1929年9月,傅斯年籌畫組織“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會”。歷史組在清理、分類、編目同時,還刊布印行《明清史料》。傅斯年在與吳豐培等人商議後決定史語所歷史組著手《明實錄》校勘整理工作,^[9]傅斯年參與校勘《太祖實錄》38卷。此外,史語所購得金石拓片25000多張,33800多卷;劉半農繼續搜集俗曲本子;對敦煌卷子搜求整理;勞幹則對漢晉竹簡尤其是居延漢簡進行整理。

史語所最大的成績就是殷墟發掘。1899年起在河南安陽地區出土的有字甲骨吸引了羅振玉、王國維等參與研究;仰韶村遺址出土的陶制鼎、鬲,使中國的歷史學家和金石學家們認識到田野考古確是研究中國古物的關鍵。傅斯年對於西方地質學、考古學有認識,他的觀點顯然高明,在傅斯年看來,金石學家手中的古器物因為離開了它們的地層,其科學性、可靠性就降低;

金石家所注意的只有刻辭銘文，就限制了考古學的範圍。現代考古學應該去古遺址實地發掘，要把古人活動的所有遺址都囊括在研究範圍中。1929年，在殷墟發掘開始時傅斯年就作《考古學的新方法》的演講，對殷墟地層進行了分析；指出除了器物，人骨測定、房屋、銅器模型、安葬方法都值得研究。傅斯年認為，考古學是研究古史的最好入手方法，考古學的價值在於文化的意義。^[10]

1928年5月，傅斯年代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立刻就派董作賓去出土甲骨卜辭的安陽進行調查，並最終選定發掘安陽殷墟。同年10月，董作賓進行了安陽第一次發掘。1929年春，李濟開始主持對安陽的第二次發掘，董作賓協助參加。董作賓通過對甲骨刻辭及甲骨出土坑位，以及共出的遺迹、遺物狀況的研究，認定《竹書紀年》相關記載完全正確，小屯一帶作為盤庚到帝辛的晚商都城從此被確定下來。從1928年10月開始到1937年夏，考古組共對安陽殷墟進行15次發掘，總面積46000餘平方米。其中對小屯一帶發掘12次，侯家莊西北崗王陵區發掘3次，另發掘洹水西岸的范家莊等遺址12次。在小屯北地發掘了53座宮殿基址。在宮殿基址附近還發現了大量甲骨，尤以乙十二基址旁的埋葬著17096片刻字甲骨的YH127坑最為出名。在小屯村北約1公里處的武官村、侯家莊北地發現了商代王陵區，發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東南約1公里處的高樓莊後崗，發掘出了仰韶、龍山和小屯三種文化層的疊壓關係，解決了華北地區這三種古文化的相對年代。在後崗還發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區，如大司空村等地還發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發掘和李濟主編的《安陽發掘報告》，對中國考古學的意義在於：1. 首創地層學和考古學文化的研究。2. 首創陶器訂名以及遺物的分類研究。3. 首創考古專題研究。4. 首創田野考古作業制度。基本確立了一套完整的田野考古作業的法則。^[11]

考古組 1930 年轉向發掘山東章丘城子崖。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發掘也出於傅斯年的倡議和組織，傅斯年認為中國古代文化是多元的，起源多處並相互影響，所以想在文獻資料之外，通過田野考古找到直接可靠的證據。殷墟發掘之外，考古組先後組織山東古迹研究會，在山東章丘縣龍山鎮城子崖、滕縣安上村、曹王墓、王墳峪，日照縣王屋村、大孤堆進行發掘；組織河南省古迹研究會，發掘過浚縣劉莊、大賁店，輝縣琉璃閣、甄匠片，鞏縣塌坡、馬峪溝等多處遺址。另外，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名義下，史語所還勘測了李三孤堆楚墓並調查了淮河流域多個遺址，董作賓、梁思永、石璋如還指導了浙江杭縣良渚鎮的發掘。

傅斯年不是考古學家，但對中國考古學的建立及其定位有著深刻的影響。中國考古學從開創伊始就形成了鮮明的歷史研究的特色和風格。傅斯年在殷墟發掘之初所作演講中指出：“考古學是史學的一部分”，“在史學當中是一個獨異的部分”。為歷史的考古學實際上更是中國考古學的基本理念和取向，這種理念和取向根源於這塊土地上悠久傳承的豐富文化和歷史知識的積澱，強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終支撐著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

中國考古學的出現和現代史上的民族主義運動有關。有些外國學者將仰韶文化彩陶的源頭向近東文明方向去追溯，中國學者則更重視中華民族文化的本源。山東城子崖的發掘就是民族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產物，當時的學者迫切地希望找到仰韶和安陽之間的文化缺環。城子崖出土的黑陶不同於仰韶文化的彩陶，證明了本民族獨立的文化淵源。1954 年，針對 C. W. Bishop 的研究結論“中國早期的文化，不是來自西方，就是來自北方，沒有任何成分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發展的”，^[12] 李濟發表題為《中國上古史重建工作及其問題》的講演，總結殷墟考古成就，指出除甲骨文字以外，用燒裂的骨頭占卜、養蠶和某些特定的裝飾風格都是起源于中國的文化，“這三件東西，整個來看，代表

一種自成一個單位、具有本體的文化”。

通過創辦史語所、倡導殷墟發掘的實踐活動，傅斯年進一步將《工作之旨趣》中的一些思想予以理論提升，《史料論略》是傅斯年史學方法理論的充分闡釋和總結。^[13]“史學即史料學”，標誌了中國現代史學方法理論的建立。

史學是史料學的思想方法，實際上就是歷史學近代科學化的標志。意大利史學家莫米利亞諾（A. Momigliano）說：“歷史研究的整套近代方法，奠基於原始史料與轉手史料的劃分此疆彼界。所謂原始史料，為目擊者的陳述、文獻（documents）以及實事自身的遺存，數者皆與事件同時。所謂轉手史料，為史學家或編年家論述彼等所未及親見的事件，僅憑傳聞或直接或間接的參稽原始史料而來。稱頌原始史料，為其真實可靠。稱頌非常代的史學家——或轉手史料——，為其對資料的解釋與評價公正。”傅斯年在《工作之旨趣》中明確要求“不談史觀，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並說這在中國是司馬光以至錢大昕的治史方法，在西方這是蘭克、蒙森的著史立足點。至於如何整理史料，傅斯年說：“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說到整理，除了對史料進行比較沒有另外法子。”

在《史料論略》中，傅斯年詳細列出了用作史料比較的八對不同性質的關係。

- （1）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
- （2）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
- （3）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
- （4）近人的著述對遠人的著述。
- （5）經意的記載對不經意的記載。
- （6）本事對旁涉。
- （7）直說與隱喻。
- （8）口傳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

在上述八對關係中，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的內涵和區分界綫迥然不同於後述七對關係，具有方法論的本質意義。根據傅斯年的定義，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在傅斯年看來，直接材料比較可信可靠，間接材料因轉手的緣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減；但有時某一種直接材料也許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時間接材料反是前人精密歸納直接材料而得的。直接材料每每殘缺，每每偏於小事。不靠較為普遍、略具系統的間接材料先作說明，就不能瞭解這些直接材料，所以必須靠間接材料“做個預備，做個輪廓，做個界落。”如果不先對間接材料有一番細工夫，這些直接材料的意義和位置也是不知道的。但是直接材料雖然不比間接材料全，却比間接材料正確得多。所以，一旦得到一個可信材料，自然應該拿它去校正間接史料。間接史料的錯誤，靠它更正；間接史料的不足，靠它彌補；間接史料的錯亂，靠它整齊；間接史料因經中間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樣，靠它給予一種活潑潑的生氣象。

傅斯年主張爲了探索歷史真相，必須不斷開拓歷史研究的資料來源。史語所的實踐特別重視原始史料的發掘，在此思想指導下的史語所在創立之初就取得了殷墟發掘的巨大成就。傅斯年在申請發掘殷墟的報告中說：“此次初步試探，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

傅斯年的理論，徹底突破了王國維“二重證據”所理解的“地下資料”的範圍。王國維理解的地下材料，基本上是指刻有文字的甲骨、金文等，它們來源雖不同于傳世文獻，但都是文字記載。而傅斯年賦予“直接史料”以更廣的內涵。“假如一件事只有一個記載，而這個記載和天地間一切其它記載（此處所謂記載，不專指文字，猶史料之不以文字爲限）不相干，則對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們沒有法子去對它做任何史學的工夫。假如天地間事都是這樣，則沒有一切科學了，史學也是其一。”傅

斯年特別注明對於事件的“記載”，“不專指文字，猶史料不以文字為限”。除了甲骨彝鼎等刻有文字的材料之外，傅斯年理解的“直接史料”還包括考古實物，如陶器、銅器、房屋及前人所製造和使用的其他器物。“古代的歷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為除古物外，沒有其他的東西作為可靠的史料。”傅斯年理論在當時的意義在於，在完全封閉的文字記錄的文獻資料之外，勇敢地去探尋過去文化的現實遺存，並將所有這些對象資料全部歸置於他所致力於建設的歷史學的領域之中，以紀錄文本對應於過去無限資訊的求證，這是對王國維史學研究經驗方法的理論提升。

傅斯年的史學方法理論受王國維學術影響。王國維的學術研究擺脫了傳統的古文獻學和金石學的框架，地上、地下資料成了互相印證研究歷史的資料。對於王國維來說，他所追求的根本不是文獻文本的校訂互證，無論是簡牘的實物形制、青銅器確定的出土地點、還是刻有卜辭的甲骨的實際用途，他都是在竭盡全力地去捕捉過去存留的各種資訊，超越文獻文本的束縛，而把目光投向過去發生的事實。二重證據法是王國維作為一個近現代的歷史研究者而不是傳統的古典考據學家提出的。^[14]

傅斯年開拓新史料還有一個關鍵的中介就是顧頡剛的“古史辨”疑古史學。古史辨運動反對六經，摧毀儒學體系，學術走向民間，提倡擴大史料範圍到民俗歌謠。“古史辨”疑古史學提出“一切歷史都是層累偽造”，是徹底的反文本的革命。中國歷史學從文本考據到追求歷史事實的現代性突破根本上是由古史辨派的徹底反文本而瞬間完成的，直如禪宗的“當頭棒喝”、痛快淋漓，不假任何假設推理反駁。從王國維“二重證據法”開始到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方法理論和重建古史，古史辨運動恰是其中至為關鍵的轉折。沒有古史辨“層累偽造”的理論，徹底粉碎儒學層層粉飾的古史舊體系，就完全談不上超越文本的古史重建，傅斯年的重建古史建築在古史辨派完成的對文本的徹底破壞基礎之上。^[15]

二 理解與批評

從傅斯年的實踐工作以及《工作之旨趣》、《史料論略》等著述中,我們勾勒了傅斯年史學思想的大致輪廓。“史學即史料學”命題是一種現代史學方法的提出,但傅斯年缺乏有效的核心概念,並用以推演至涵括其寬廣豐富的史學思想,傅斯年並沒有真正建立起自己完整嚴密的史學理論體系。傅斯年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開創者,他的史學方法理論具有開創現代史學的最寶貴價值,值得深入地發掘理解;在今天的知識背景下,筆者還可以對傅斯年的史學方法理論作一些有建設意義的批評和修正。

1. 關於科學思想

傅斯年對乾嘉樸學充滿敬意,他認為清代的學問是對宋明學問的一種反動,很像西洋 Renaissance 時代的學問,正對著中世紀的學問而發,可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他以為,宋明的學問是主觀的、演繹的,是悟的、理想的、獨斷的;而清代的學問是客觀的、歸納的,實證的、經驗的、懷疑的。清代的學者是“本著親歷實驗的態度,用著歸納的方法,取得無數的材料,翻來覆去,仔細考索,求異求同”,^[16]“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17]但是,傅斯年又以為,整理國故“若直用樸學家的方法,不問西洋人的研究學問法,仍然是一無是處,仍不能得結果”。所以要研究國故必須引進西方的“科學的主義和方法”,二者應是“一和百的比例”。^[18]乾嘉學者最堪自豪的語文學成就也始終不能發展出現代語言學,所以傅斯年說乾嘉樸學還不是真正的“西洋方法”、“科學主義和方法”。

傅斯年留學歐洲英國、德國長達七年,接受數學、心理學、物理學等現代科學訓練。但傅斯年肯定清代學者的歸納方法,而

批評宋明學者的演繹方法；他認為的史學就是“史料編輯之學”，^[19]只要不斷地開拓新史料，非常奇特地表現出綜合歸納式思維。其中固有傳統文化和國學背景深厚的原因，更直接與傅斯年對統計學有特殊偏好相關，傅斯年在中山大學承擔的課程是《統計學方法導論》，在《史學方法導論》中有《統計方法與史學》的擬目。乾嘉考據學不是現代科學，根本原因在於，乾嘉樸學使用的不是演繹推理，而是綜合歸納方式，歸納無法推理而產生系統新知，也難於接受批評校正。傅斯年未刊稿《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近代史學，史料編輯之學也，雖工拙有異，同歸則一，因史料供給之豐富，遂生批評之方式，此種方式非抽象而來，實有事實之經驗。”^[20]“因史料供給之豐富”，如何“遂生批評之方式”？有唯科學主義傾向的傅斯年却未能加以說明。

傅斯年反對疏證，反對“史觀”。無論是傳統經學的疏證，還是唯物主義的史觀，針對的都是被抽象的價值而不是事實。對於傳統文化，是聖人設定的關於總體文化的“道”、“理”在前，為六經疏證，“求的是孔二先生、孟老爹爹的真話”，“所以他要求諸六經，而不要求諸萬事萬物”。^[21]傅斯年反對“國故”，並堅決反對復興國學。^[22]對於唯物史觀，是馬克思關於整體歷史的“客觀規律”在前，應用整體歷史的“客觀規律”來解釋歷史現象。傅斯年說，“歷史這個東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談”，^[23]傅斯年不贊同“史觀”，《史料論略》：“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傅斯年認定，“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24]實際上，歷史只有無限的具體的過去事實，根本無法抽象出所謂規律來；歷史的主體是創造文化的人，而不是外在的規律。只有歷史具體事實的真，不存在關於人類整體歷史的超越文化的所謂真理。

20 世紀初,帝國崩潰,經學沒落,史學因為可以“經世致用”而被賦予了往昔經學的使命,^[25]中國學人表現出易於接受社會發展規律的整體歷史觀,處於民族文化存亡之際,民族主義的盛行也促進了社會進化論思想的傳播,中國史學社會科學轉向。唯物史觀的社會進化論被尊奉為唯一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規律,是歷史具有整體性以及認識整體歷史的“神目觀”造就的。歷史學走“社會科學”或“國史”(正史)的路,就不可避免化約論、目的論、決定論的危險。^[26]20 世紀 20 年代到 30 年代,梁啟超、胡適、傅斯年等開始討論歷史研究法,這是在歷史科學研究中徹底放棄信仰“規律”,致力於切實地探尋各種有效的研究方法以理解過去無限的具體的事實。但處於緊迫社會行動的革命熱浪之下,這個有科學進步意義的轉變並沒有完成。

傅斯年的思想是科學實證的,^[27]他堅持“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史語所工作始終致力於建立中國的科學的歷史學。^[28]傅斯年對集蘭克學派史學方法之大成的伯倫漢(Ernst Bernheim)的《史學方法論》,曾反復閱讀,以至這部書被翻爛不得不在 1937 年重裝。蘭克(Leopold Von Ranke)以為歷史研究承擔的責任只是揭示“往事的真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what actually happened, how things actually were)。蘭克學派的要旨是:高度重視第一手資料,用審查、批判的眼光對待史料,強調據實直書的態度,提倡要弄清提供史料者的身份、性格、環境等,然後確定其價值的方法。

傅斯年強調:“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許冠三以為這句話可能典出英國史家屈維廉(G. M. Trevelyan),“Collect the fa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29]但顯然,這句話的真義不在於“上”、“下”去的地方,而在於動手去做。傅斯年歸國前一本筆記本其中有言:“若不去動手動腳的幹——我是說發掘和旅行——他不能救他自己的命。”王汎森認為這就是“上窮碧落下

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初稿。^[30]這句話的語義“動手動腳的幹”，即發掘和旅行。再進一步，“找東西”，找的是各種各樣的“東西”，不管是發掘和旅行，都是摸索尋找的，並沒有指定最終唯一的目的地。從這裏我們看到傅斯年的科學求真是要求不斷地嘗試，去尋找各種新材料，這個思想其實很接近實用主義哲學：科學是可錯的、猜想性的知識，^[31]科學知識是因為人類積極的探索試驗而不斷增長的。

2. 關於“史料”

“史學即史料學”對歷史研究有著向各種資訊開放的極為有利的一面，這種開放，是史學現代化的表現；也促使了中國考古學的形成，並且實在提供了證明過去歷史事實存在的物質遺存及豐富資訊。成熟的現代考古學更提供理解人類過去的社會和文化的獨立的視角。但傅斯年這個方法理論本身存在著缺陷。傅斯年自己對此有所意識，他一面主張運用考古成績做治史的材料，一面則揭示考古只是局部，闕照全體仍必須靠文獻材料。對王國維運用甲骨文整理出來的商代世系，傅斯年說：“假使王君不熟悉經傳，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使熟悉經傳者不用這些材料，經傳中關涉此事一切語句之意義及是非是不能取決的。”^[32]傅斯年對自己的“史料”的問題有所意識並在歷史研究中盡可能地予以了使用限制的約束。雖然局部和全面、偶然性和概要性等等可以視為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的一些區分指標，但兩者的實質區別并非在此。

傅斯年雖然已經敏感地意識到歷史文獻資料的語言屬性。但處在當時的知識狀態下，剛起步的考古發掘完全沉浸於有文字的殷墟卜辭，對考古學本身的性質還未作深入思考，在“史料”這個概念下也無法建立考古資料和文字資料的相互關係。如果作為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史料”從文字文本無限擴展到任何實物及相關資訊；並且，就在“直接史料”這層意義上，等即使

用考古物質遺存與原始檔案來研究歷史,那麼,“史料”這個概念本身就已不再是可以分析的概念工具了。傅斯年這樣的“史料”觀,一直到 70 年代法國年鉴學派的“新史學”還在提倡,勒高夫說:“一個統計數字、一條價格曲線、一張照片或一部電影、古代的一塊化石、一件工具或一個教堂的還願物,對於新史學而言都是第一層次的史料。”^[33]歷史研究的是事實變化之過程,這種一去不返的唯一的“真”只存在於經歷事實並得以即時認知記錄的原始記注,所有的物質遺存只能呈現物體自身存在的性質,而無法表述事實變化的過程。沒有原始記注關於真實“事件”的敘述,考古遺存完全無法自主描述“事件”過程。歷史知識的基礎始終是文字的敘述文本。文字文本材料和非文字文本材料是異質的,對於作為原子事實的歷史的“事件”而言,非文字文本材料能夠提供促進這種知識增長的無限資訊,但卻始終不能獨立構成歷史知識本身。對於歷史研究,敘述事件的文字文本和物質遺存及其他資訊完全不等價。傅斯年比附性地把考古發掘的物質遺存和原始檔案並列作為直接史料,以筆者現在看來是個自行消解“史料”概念的錯誤。

傅斯年要擴張史料到一切範圍,這個範圍當然包括語言文字本身在內的各種文獻資料。在《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傅斯年承認語言學和自然科學一樣,能夠為歷史學提供工具。在具體到研究學問必須工具的進步問題時,傅斯年專門討論了語言學,他認為中國歷來研究音韻學的學者都審不了音,西洋人知道梵音,所以容易入手,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傅斯年的這個說法很值得注意。語言不僅本身是研究的資料,

而且傅斯年還將語言比較作爲了研究的工具。語言比較工具表明傅斯年心目中真正的區別和研究的對象是文化。

3. 關於歷史學和語言學的關係

傅斯年做《性命古訓辯證》，是試圖證明歷史學和語言學關係的一個努力，但傅斯年的這項研究“用語學的觀點所以識性命諸字之原，用歷史的觀點所以疏性論歷來之變”，僅僅是思想史研究。

傅斯年研究過丟勒的《形式邏輯》、耶方斯的《科學原理》；對於字和詞區分清晰。尤其重要的是，傅斯年對乾嘉吳派惠棟通過“求古”而求真與皖派戴震重視“裁斷”而“求是”的不同和短長，曾有非常精彩的辨析，“清代樸學家中惠棟、錢大昕諸氏較有歷史觀點，而錢氏尤長於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別時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誤彼等不少。蓋‘求其古’尚可藉以探流變，‘求其是’則師心自用者多矣。”^[34]

十分可惜的是，在接近歷史學和語言學關係問題癥結的地方，傅斯年止步了，《性命古訓辯證》使用的還是乾嘉皖派語詞訓詁的方法。作爲被抽象的價值，詞彙概念所表述的觀念當然是思想史研究的好的對象，^[35]但是，概念稱名在歷史文化的變遷中、在不同的使用者中是在轉移、擴張、分離，發生著各種變化的，對於追求事實之真的歷史學的研究來說，概念分析確認的困難不言而喻。文本意義的基本單位不是概念而是命題，命題由一個或一組內部邏輯結構的陳述句所構成。命題是句子的謂述與真之間的關係，如果不理解謂述，我們畢竟不理解任何句子是如何工作的，因此也就不能說明語言可表達的最簡單的思想的結構。傅斯年無法用《性命古訓辯證》來證明歷史學和語言學的關係，根源於沒有受到分析哲學的訓練。更深層次說，傅斯年的思維方式是綜合歸納的而不是分析演繹的。

乾嘉吳派和皖派都是囿于經學的考據學，兩派的區別，在於

吳派從事的基本是文獻學研究,皖派從事的基本是語文學研究。在筆者看來,皖派傾向於把“真”建築在語詞,吳派傾向於把“真”建築於句子。^[36]

歷史學研究過去的事實,語言學研究句子的形式,兩者之間的聯結點在於確定一個事件為“真”的命題陳述。歷史研究是為瞭解人在過去的社會行動而展開的研究。過去的行動事實是用陳述句表達的,而不是可用“應該”引領的祈使句、命令句,也不是感嘆句。歷史研究的初始的基本單位是事件。事件由在現實生活中感知記憶并實錄了事態變化或發生過程的歷史記注者所定義;歷史記注是關於社會行動事實的即時記錄。事件由這樣三項所共同決定:(1)人的社會行動;(2)記注者的即時記錄;(3)前兩者共處的文化所賦予的真實的意義。事實的真,是由共用同一種語言的行動者和記注者的文化所賦予的。原始即時的記注是該文化確定的意義的真,在人類文化中,我們視原始記注的事件和事件的意義為同一,記注的語言和所記注的言語行為最緊密關聯。依靠理解而認識的我們再也不能更進一步地質疑它們之間的聯結,分離它們就意味著徹底反對我們用作表徵同時也用以思維的語言,而成為完全的神秘主義者。

雖然往事已逝,但記注在文化中傳遞了意義。筆者相信對歷史事件的“真”的研究就是對它所存在的文化的理解。若某一語句為真,則必定存在某種與之相應的事實,否則它就沒有意義。如果我們宣稱某一語句表達了事實陳述,而不瞭解當該語句為真時的實際情況可能如何,那麼,這一語句(對我們來說)就是無意義的。歷史研究者從文獻文本中尋找、萃取出原始記注的事件,並將記注放到其所生成的文化的意義之網中予以深入的理解;探索事實真相,更是理解文化。由於語言意義的文化傳遞,這種理解成為可能。歷史研究是科學批判的文本考據和闡釋性的文化理解的交疊不斷的深入。

人類歷史並不是事件因果相連的綫性聯繫,而是綿延的文

化之網。歷史學家安置串聯各種事件、建立自己假設的形形色色的長時段歷史，目的正是敘述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在年鑒學派看來，“事件”應該讓位給社會、經濟、心靈的深刻歷史。不存在整體的唯一的歷史，也沒有觀察所有事件的上帝之眼，長時段歷史撰述的意義在於對人類知識譜系的無限探索。歷史撰述是歷史研究者選擇對象事件進行研究的心理和知識背景；歷史研究的無數新成果則被不斷出現的新的歷史撰述吸收安置。歷史研究和歷史撰述互為基礎，不斷增進人類的歷史知識。

4. 關於考古學

考古學提供了歷史學作為知識存在的獨立證明。^[37] 考古學獨立發展了判斷歷史遺迹和遺物的先後關係秩序的考古學年代學，依靠地層學和類型學，考古學建立起遺迹和遺物的相對年代，而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測定考古發掘物更可以測得考古遺存的絕對年代。由此，在歷史學依靠文獻記載和曆法學研究之外，考古學獨立建立了關於過去歷史年代的新尺規，提供了歷史“時間”最有力的實證支援。

傅斯年認識到，“中國人考古的舊方法，都是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國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38] 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文化”這個概念正是考古學最偉大的貢獻。^[39] 在科西納（G. Kossinna）提出的考古學文化概念的基礎上，柴爾德（V. Gordon Childe）將“考古學文化”系統運用於考古學分析，《歐洲文明的曙光》運用“考古學文化”作為一個基本單位來從時空上編排考古學材料，利用文化遺存來建立一個地區文化發展的歷史，成為考古學上的一場革命。

發掘過去的遺物は考古起始時的工作。遺物は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生產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及裝飾品等，一般都指經過人類有意識的加工和使用，反映了古代人類的活動。傅斯

年說：“周朝鍾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糾正古史的錯誤，可以顯明在研究古代史，舍從考古學入手外，沒有其他方法。”^[40]“我們從陶器的變化可以知道古代文化的變遷，所以沙鍋陶器等等，是研究古史唯一的好史料。”^[41]遺物並不是語言文字提供的認知綫索，而是關係人類過去生活的物質遺存。在特定區域的考古學文化的同一地層中，物質遺存及其組合關係提供了一套關於人類文化行為的符號系統，對這套符號系統的深入研究和解釋可以理解這個特定的文化，理解這個文化中的人及其社會行為、理解文化的價值觀和信仰。

考古發掘揭露出來的是古代文化的地層。這個地層中的物質遺存是真實的歷史遺存物。傅斯年雖然不是考古學家，但對考古學還是相當理解：“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屬於文化方面，不比現代材料，多可注意於人事方面，因為文化史，特別是古代史的著意點，不是單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東西去研究，固然有相當的結果，所得究竟有限，況其物的本身，間有可懷疑之處，所以應當注重整個的觀念。”^[42]文化，究其本質是借助符號來傳達意義的人類行為。語言、人造物和技術，是文化的不同符號系統。文字記錄了語言，工具物化了技術，考古遺存的人造物組合也獨立構成文化符號系統。

殷墟發掘從開始時收集有字甲骨到收集各種遺物，並從遺物收集漸漸轉向對遺迹的關注。最初的殷墟一次、二次發掘都只是以點為單位的挖坑，在遺迹方面難有收穫，到了第十三、十四、十五次，以體為單位發掘，無論是窖穴、墓葬還是基址，都是找出整個輪廓後的整體發掘揭露，以 10 米見方為一個小單位，40 米見方為一個大單位，在每個大單位中央安置一架平板儀和一條 30 米長皮尺，發掘中如有重要遺物出土均直接繪入總圖。這三次發掘總面積 12000 平方米，前九次殷墟發掘總 8000 餘平方米。中國最早的田野考古發掘，是按深度計層劃分層位的，這

樣的方法不利於揭示堆積間的關係。董作賓主持的殷墟第一次發掘配備了測繪員，繪製了殷墟附近及發掘分布圖、發掘殷墟分坑次平面圖，並有簡單照相，對收集物造冊登記；李濟批評就地掘坑，直貫而下，只重視有字甲，地圖簡略，地層紊亂。⁽⁴³⁾李濟主持的第二次發掘雖然注意地層，但也只是細化了出土物和地層資料記錄，擴大遺物收集範圍，並沒有本質改進。1931年梁思永主持安陽後岡發掘時改變了過去的水平層位法，而去揭露自然層的疊壓狀況。在這次發掘中，梁思永根據土色掌握了單純的“仰韶文化”的堆積。在整理過程中，他又清除了混入晚期地層中的早期遺物，使各時期遺存的本來情形準確清楚地顯示了出來，正確地解決了堆積實際存在的層位關係問題，使考古學獲得了一個可靠的科學基礎，標志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建立。

遺迹是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痕迹，包括遺址、墓葬、灰坑、岩畫、窯藏及游牧民族所遺留下的活動痕迹等，其中遺址包括城堡廢墟、宮殿址、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廟址、礦穴、采石坑、倉庫、水渠、水井、窯址、壕溝、柵欄、圍牆、烽燧、長城、界壕等，遺迹能够反映當時人類的活動。一個古代文化的居住遺址，包括住房、宗廟、作坊、墓葬、道路、水渠、水井、壕溝等，因為考古的地層的整體發掘，這樣就完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它們的形態、功能、組合、分布、位置和空間關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古代真實的景觀圖像，這幅景觀圖像提供了古代社會生活最直觀、最完整的資料。這種真實的表現人類利用的地貌景觀就如圖畫、攝影照片（考古現場也要求保存各種繪圖乃至航拍照片）。

傅斯年在《考古學的新方法》中，不僅講到了人骨測定，還講到了箭頭形制、銅器模型和治龜技術。殷墟發掘的陶器、青銅器乃至卜龜的鑽鑿等等都是技術的表徵。技術是物質遺存內含的文化的另一套符號系統，最近二十年來，更多的學者開始將技術當作自身就是一個認知系統（cognitive system）來研究。各種遺存的人工製品都是技術的物化表現，工具是最典型的物化技

術。能够使人成為人的語言、工具、形象同時產生,也就是說,人同時具備三種基本的行為形態:認知、製造和表現。山田慶兒定義人是利用工具製造工具的動物。^[44]在頭腦中“製造”一次性工具和反復使用工具方法根本不同。打算製造反復性使用的工具,事先在頭腦中不僅要描繪出在“此時此地”由這個人來砍倒這棵樹的方便的特定工具,而且還必須能够描繪出在其他時間、其他場所、由具有平均氣力的人砍倒別的樹木也都能使用的工具,也就是必須具有區別於具體的一般性概念“斧子”。因為人的語言和工具是超越了“此時此地”這樣一種狹窄的框架,並且以圖像即觀念為中介相互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它們肯定是同時出現的。當獲得了這種“二級特性”的時候,人類就誕生了。^[45]傅斯年說:“在古代的墳墓中,掘出許許多多的銅器,製造亦很進步。銅器模型,是占這些銅器中間一大部分。”^[46]以銅器模型為例。濟南大辛莊貴族墓 M139 出土的商代青銅器,發掘者認為屬於二里岡文化時期,^[47]但大辛莊 M139 鼎一周有 6 組獸面紋,表明它年代不早于中商文化時期。中商文化開始加強青銅器裝飾性,容器的合範技術為滿足裝飾而複雜化,許多鼎一周用 6 塊外範,因此在一些鼎上出現 6 組紋飾;而此前的鼎 3 組紋飾,對應的是 3 塊外範。^[48]

因為考古學的出現,歷史學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考古學的分析概念工具“斷代分期”的基礎上,^[49]福科(Michel Foucault)提出了“斷裂”的概念,形成了“知識考古學”;起決定作用的是歷時間斷性(非綫性連續性或橫斷空間系統),而不是歷時連續性(綫性連續性)。^[50]福科在其後期將“知識考古學”改為“譜系學”。“整個歷史傳統(宗教的或理性的),目的在融單一的事件於理想的連貫(continuity)之中。……然而‘實際的’(Effective)歷史,只涉及事件最獨特的特徵,最敏銳的表現。”^[51]根據筆者的理解:由斷裂共時層面的文化的理解即知識考古而回復到尋求文化延續的歷史綫索,人類知識迄今為

止對歷史學的最清晰簡明的定義是“知識譜系學”。語言文字傳遞的歷史知識之外，考古學給了我們新的認識，相對於人之成為人同時產生的語言、工具、形象，知識譜系也可分為思想觀念、技術、圖像三類。

5. 關於證據法

傅斯年將地下材料擴充到了文字之外，却也給“史學即史料學”命題帶來了困境。蘭克學派的史料是指原始檔案，蘭克著《1494—1514 年的拉丁和日爾曼民族史》幾乎遍訪歐洲的國家檔案館和私人藏書樓，使用的史料包括“回憶錄、日記、信函、外交報告、見證者的敘述”。稍後另一位德國史家蒙森搜集彙編《拉丁文銘刻集成》，並寫了《羅馬史》。但他們使用的始終是文字材料。“史料”英語是 sources, source 本意是“源”，蘭克學派秉筆直書，主張恢復到史料生成的環境，考察分析史料提供者的身份、性格、環境等。但是，當直面考古發掘揭露的古代文化地層，我們就可以憑藉遺迹的景觀圖像，想像古代的生活場景，理解古代文化。1950 年，荷蘭歷史學家雷尼埃（Gustaaf J. Renier）就已經指出，應該用存留至今的過去的“遺迹”（traces）的觀念取代“史料”（sources）的觀念。^[52]

傅斯年理解考古學的新材料不止於文字，但對於歷史研究的目的，傅斯年難以明確。考古新材料，可以在某些地方實證傳世的文獻，甚至可以對傳世的文獻提出質疑和批評，但是，就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這樣做的目的始終還在於“證”史，而不是就新材料而提出關於歷史的新知。關於利用考古遺物對傳世文獻提出批評，可以舉一例，《考工記》被認為可信文本，其“六齊”條提供了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一份青銅合金配製表，^[53]但根據對先秦青銅器合金成分分析，從日前所搜集的 979 個樣品 1040 組資料看，先秦青銅器的錫含量集中在 4%~20%，只有“鍾鼎之齊”、“斧斤之齊”在這個範圍內，先秦青銅合金的

實際含錫量遠遠低於文獻記載。^[54]

歷史研究的對象“史”不是文本上的“史”，而是過去真實的歷史；歷史研究的日的因此不是爲了“證”史，而是爲了探索發現關於真實歷史的新知。對於考古的遺物遺迹，我們不斷對它們做出闡釋性解釋以理解古代文化；同時，我們對一個單位的遺物、遺迹內涵進行分析，可以產生對古代文化的確定的新知，比如，一個整體發掘揭露的村落遺迹，有道路、宗廟、住房、作坊、水渠、水井、墓葬，墓葬中有棺槨、人骨、獸骨、陶器、珠串等，就可以用技術的、圖像的分析來探討這個社會的形態、經濟的狀況、生產的水準、宗教的信仰等等。這種封閉的分析要比拼合各種來源不一的文獻史料要精確、可靠的多。假設窖藏裏還有鑄刻銘文的青銅器，那麼這更是當時的史料（contemporaneous historical sources），完全不受污染的，當然，需要運用傳統的文獻來理解銘文的語詞，但那不過是起輔助性的作用。

（作者：上海大學思想與知識史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 本文爲朱淵清教授 2011 年 11 月爲《人文中國學報》第十八期而作，後收入作者自選集《知識的考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8 月版）中。

注釋：

- [1] 傅斯年是民國時期最清晰認識到現代社會責任信托專業分工合作特質的學者，他堅持史語所從事科學創新的尖端研究，反對號令公衆的推廣普及。沒

有傅斯年對現代性的認識踐履，史語所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的科學進步。現代社會的勞動分工體現在社會所有領域，1946年1月在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傅斯年與陳布雷筆談蔣介石，傅斯年寫道：“蔣先生對上海市民言明禮儀、知廉耻、負責任、守紀律，此乃國家元首所以責其公務員而負責做到者也，非對人民之言也。”（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年，135頁。）但是，即便60多年後的今日中國，行政首腦們還是完全不能體認這種現代性的責任承擔的職業道德。

- [2] 許倬雲《社會科學觀點的轉變與科際整合》，《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2000年。
- [3] 曾經以各種名義受聘于史語所的學者有：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朱希祖、沈兼士、劉半農、顧頡剛、梁思永、梁思成、李方桂、董作賓、容庚、丁山、史祿國、羅常培、辛樹幟、俞大維、林語堂、徐中舒、馮友蘭、許地山、羅家倫、楊振聲、袁復禮、吳定良、凌純聲、芮逸夫、吳金鼎、丁聲樹、徐旭生、岑仲勉、陶雲逵、韓儒林、王獻唐、湯用彤、趙萬里、陳受頤、向達、那廉君、郭寶鈞、勞幹、高去尋、石璋如、陳槃、李光濤、張政烺、全漢升、董同龢、楊時逢、夏鼐、胡厚宣、傅樂煥、李光宇、周祖謨、王靜如、容肇祖、商承祚、余永梁、單不厂、陳樂素、于道泉、劉耀（尹達）、周一良、李晉華、王崇武、陳述、嚴耕望、周法高、張琨、劉念和、楊志玖、李景昀、何茲全、馬學良、屈萬里、遂欽立、吳相湘、姚家積、王明、王叔岷、黃彰健、楊希枚、王利器、李孝定、任繼愈、胡慶鈞、張秉權、嚴學窘、傅懋勳等。
- [4] 《經義述聞》、《讀書雜誌》研究的是古籍的語文問題，《經傳釋詞》則在這種語文研究上明顯進步，有了對虛詞使用例則的概括和總結。
- [5] 梅祖麟《中國語言學的傳統和創新》，《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學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2000年12月。
- [6] 傅斯年的藏文老師 Herman Frank 也教過陳寅恪，梵文文法老師 Lüders 是梵文泰斗，也是陳的老師。
- [7] 李壬癸《七十年來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回顧》，《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學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2000年12月。
- [8] 1922年，教育部歷史博物館將這批檔案裝入8千個麻袋中，稱重15萬斤，以4千大洋賣給北京同懋增紙店，後為羅振玉、李盛鐸先後收藏，李因租房屋漏檔案有損擬賣出。在傅斯年、蔡元培、楊杏佛、陳寅恪、馬衡等人努力下，由

中央研究院買下,交史語所整理。

- [9] 黃彰健〈吳豐培、傅斯年、李晉華三先生討論校勘〈明實錄〉的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的工作》,臺灣《大陸雜誌語文叢書》第三輯第三冊。
- [10]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11] 蔣祖棣《20世紀夏商周研究的進展》,《考古學研究》(五),科學出版社,2003年。
- [12] Carl Whiting Bishop, The Neolithic Age in Northern China, *Antiquity*, Dec. 1933.
- [13] 《史料論略》是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中的一部分。傅斯年另有《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其中有一節題目也為“史料論略”。
- [14] 當然,從王國維和陳寅恪對《秦婦吟》的各自研究的比較就可看出,王國維的歷史研究的語文學、文獻學的痕迹還太明顯;譜系、地名、各種制度,都是符號化的“名”,它們還不是人的行動的“事”。
- [15] 朱淵清《一場情感直覺的革命》,馬來西亞第七屆漢學國際會議論文,吉隆坡,2010年3月。
- [16] 傅斯年《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17] 傅斯年《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18] 傅斯年《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19] 傅斯年《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20] 傅斯年《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21] 傅斯年《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22] 傅斯年《論學校讀經》,《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23]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24]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25] 在清末民初，史學因“經世致用”而被強調。章太炎《論經史儒之分合》：“承平之世，儒家固為重要；一至亂世，則史家更為有用。”西方民族主義思想的傳入，史學的社會功能更被提升到國家與種族（文化）存亡的高度。因為外患日迫之世，考據之學無關世用，所以應以微言大義之旨講求經史之學，張之洞《勸學篇·內篇》：“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鑒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略之。”徐仁鑄《輶軒今語》看法相近。梁啟超把史學看成是明掌故得失通曉世變的學問，而認為與西學同具致用性的功能，《新史學》說：“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承擔經世致用之責，還因為時人所認知的史學與科學的關係，陳黻宸《中國史講義》：“科學不興，我國文明必無增進之一日。而欲興科學，必自首重史學始。”因為史學是“凡事凡理之所從出也”，“史學者，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也。無史學則一切科學不能成，無一切科學則史學亦不能成立。”
- [26] 艾爾曼《中國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討論的意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2期，1992年5月；《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序，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 [27] 施耐德指出，30年代中期以後，傅斯年的實證主義思想開始出來變化，到40年代以後他甚至要求在研究中更加重視主觀因素。參見施耐德《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72頁。
- [28] 這個目標在中國明確提出距離劍橋史學家伯裏（J. B. Bury）說“歷史是科學，不少也不多”只有24年。
- [29]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嶽麓書社，2003年，245頁。
- [30]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灣三民書局，2004年，108頁。
- [31] 實用主義的創始人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認為，有風險的假設推論或猜想是邁向知識的第一步，他以“悔悟的可錯論”（contrite fallibilism）精神展開自己的研究結論。杜威（John Dewey）認為知識是改造經驗的成就，它的求得須通過試驗的程式：試驗包括行動，是在環境與我們之間創造確定的變化；試驗的發生受觀念指導，是有目的的活動；試驗的結構重新組織了原來

的知識,使其更易於被認知。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評價實用主義最具力量之處就在於:“可錯論與反懷疑論的結合,對於人類心靈的一種自然主義態度,以及它的這樣一種文化:拒絕屈服於任何種類的科學主義。”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是可錯論者,他認為知識的成長是人類尊嚴的最偉大資產,他反對歸納主義的發現邏輯,反對概率主義歸納邏輯的確證理論,拒絕承認把理論評價同逼真性聯繫起來的歸納原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代表了理性的進步發展:把注意力從理論的證明轉移到理論的發現。

- [32] 傅斯年《史料論略》,《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33] 雅克·勒高夫《新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7頁。
- [34]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引語》,《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35] 海德格爾相信,如果能把千百年來一個詞所承受的分解、漂流、重組的污染一層層撥開,就可以構成一部思想史。
- [36] 朱淵清《書寫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3頁。
- [37] 加拿大考古學家坎格爾(Bruce G. Trigger)確信,只有考古學才能為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件提供證據。
- [38]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39] 德國考古學家科西納(G. Kossinna)最早明確提出考古學文化概念、并用考古學文化來研究區域文化歷史,他指出“文化群即民族群,文化區即民族區”,因此文化的差異就反映了民族的差異。在地圖上標出一類器物的分布代表了某一民族群體的分布,文化的延續反映了民族的延續,考古學因此就能夠根據器物確定的文化單位來追溯民族群體的分布和延續。
- [40]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41]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42]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43] 李濟致傅斯年函,史語所所檔“元”25—3。
- [44] 此前,弗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定義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但這個定

義現在已經被人類學家、動物學家修訂，卷尾猴能够使用工具，黑猩猩能够製造工具。

- [45] 山田慶兒《技術的意義》，《古代東亞哲學和科技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 [46]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47] 《濟南大辛莊遺址 139 號商代墓葬》，《考古》2010 年第 10 期。
- [48] 承昌平兄告。參見張昌平《論濟南大辛莊遺址 M139 新出青銅器》，《江漢考古》2011 年第 1 期。
- [49] 馬克思首先提出了社會形態分期的觀念，柴爾德的考古學受馬克思思想影響，福柯受考古學和馬克思的雙重影響。
- [50] 福柯《知識考古學》，三聯書店，1998 年。
- [51] 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汪民安、陳永國編《尼采的幽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
- [52] Gustaaf J. Renier, *History, its Purpose and Method*, Allen & Unwin, London, 1950.
- [53] 《周禮·考工記》：“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 [54] 蘇榮譽《〈考工記〉“六齊”研究》，《中國科技典籍研究》，大象出版社，2006 年。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u Sinian's Historical Science

Zhu Yuanqing

(Director, The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Visiting Schola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Fu Sinian (1896—1950) was an eminent scholar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marks the advent of modern liberal arts scholarship. His modern methodology is revealed in his theory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is the same as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sources.” He advocated that historical sources be used as a guide to enter the past world and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be related to archeology and textology but free from the interferenc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 present essay discusses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Fu Sinian's study of history. The discussion will focus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alysis, comprehension, and critique of five aspects, namely his scientific thought, concept of “historical resour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linguistics, archeology, and evidence method.

Keywords: Fu Sinia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rcheology, historical sources, relics